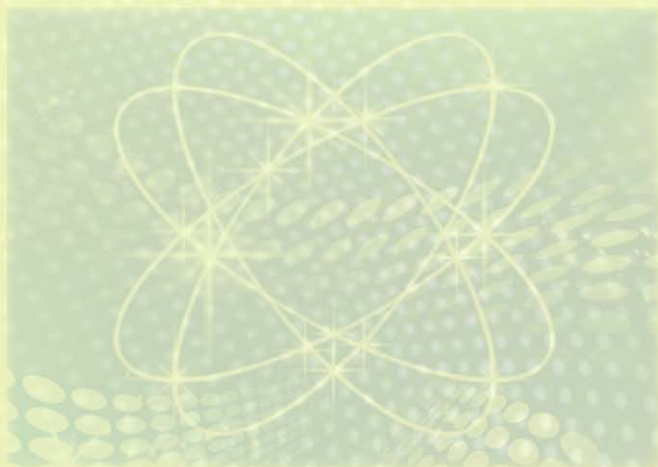


人类学

民族学与西南民族研究（下册）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总序

民族学/人类学 (Ethnology/Anthropology) 学科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该学科人才荟萃, 成果丰硕, 可以说在全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在费孝通先生亲自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共建的省院省校合作“民族学重点学科”, 开展了对云南特有族群的较大规模调研, 对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点的追踪研究, 承办了教育部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暨国际学术会议, 组织编撰并出版了“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共 25 本), 参与了国家民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的献礼图书《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共 28 本) 等重要书籍的编写工作, 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将整个学科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众所周知, “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个大学科中的核心分支学科, 主要侧重研究人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以传承文明、发掘各类有益的“地方性知识”(Clifford Geertz 语) 以及开阔人们的眼界为己任, 以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族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识为职志, 进而为实现相互间和谐共处之目的服务。该学科具有“全观性”(holistic) 以及“透视性”(perspective) 等特点, 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法国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将“理解他人的文化”(Understanding Other Cultures) 作为民族学/人类学这门学科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同费孝通先

生关于该学科应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为指导方针的主张，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无疑为我们廓清了诸多的疑团和迷雾，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要沿着前辈们所指引的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为了更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不畏艰辛、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力争使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并希望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我们不揣浅陋地推出了这套“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作为献给学界同仁以及即将于2008年在昆明隆重召开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一份薄礼。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不断有更多更好的新作汇入这套丛书中来，为真正建成能够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增砖添瓦！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编委会

2006年3月于昆明

目 录

回忆：越南——1950 年	(1)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人类未来	(13)
欧洲共产主义：他们的术语还是我们的术语	(21)
政治人类学导言	(34)
区域体系模式的研究与库拉交易圈	(39)
中国南方民族史	
——泰人迁徙之分析	(46)
The Family Structure and Everyday Life of Puer Dai People in Jinping County	
.....	(54)
The Evolvement and Function of the Kaxie System of Lahu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84)
Preservation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and Inheritance of Naxi Culture	
.....	(100)
Globalization,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108)
Naxi Businessmen and Their “Entrepreneurship”	(168)
Inheritance of Dai Cultur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Dai Park in Xishuangbanna	
.....	(185)
An Exposition on the Funeral Rite and View of Soul of the Dai Nationality	
in Jinping	(212)
A Study of Folk Beliefs Among the Dai People of Jinping	(228)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tudies in Yunn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	(247)

Catholicism and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iao Ethnic Group in South Yunnan	(275)
The Jinping Dai Ethnic Group's Notion of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in Their Local Belief: Take Jinshuihe Village of Jinping as An Example	(294)
Kemu People's Identity and Their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turning Recognition"	(313)
The Water Culture and Water Wisdom of Naxi People	(335)
跋	(379)

回忆：越南——1950 年

1950 年 6 月 25 日前的越南，是整个东南亚的一个相当悠闲的海滨散步的地方。然而，当北朝鲜军队神速推进到朝鲜半岛南端海岸的釜山一带时，便改变了那种景况。一夜之间，气氛就变得紧张、捉摸不定，乃至像是一场梦魇。压倒一切的背景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完全打乱了任何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人，曾对东亚可以预见到的前景所做的一切构想。

“国防联合军事防卫援助计划东南亚考察团”（即更普遍为人所知的梅尔比——厄斯金调查团）于 1950 年 7 月 15 日抵达西贡。法国高级专员利昂·皮格农以及驻印度支那法军总司令马塞尔·卡彭蒂尔带着未加掩饰的不安的情绪接待了调查团。作为法帝国的支持者，这两个人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对殖民主义的一贯态度并同样明显地相信，不曾有过任何事情足以使这一态度软化下来。回过头看看，这种谨小慎微是可以理解的。在美国很少有人认识到，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所持有的那种顽固的偏见，正如何在吞噬着美国人曾经信奉过的一切，并会在未来许多年内继续这样做。但无论如何，直到此时，反共产主义只是法国人行动的一个较次要的动因。

虽然存在着相反的推测，这次东南亚使命不是源起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事态进展的反响，其源起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几乎是急切的反应，部分则是些很不着边际的事情。

除菲律宾群岛外，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总是被忽视了，而且专门知识实际上并不存在。欧洲的殖民政策阻碍了美国的卷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很不客气地在一些场合公开地对那种让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的想法提出质疑。然而，其主要的结果只不过是得罪了查尔斯·戴高乐将军，这易于做到，而且在那时未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日本垮台的那番忙乱之中，没有人想到阻止欧洲的军队返回该地去。胡志明在其丛林中的基地上，一直得到一小支战略军需部队的援助，这导致了他在 1945—1946 年间数度呼吁请美国给予支持以反对法国人的重返。但很明显未得到

一个答复。这很可能不是由于精心策划的政策，而是由于这种呼吁在战后一涌而来的那些问题中所占地位的微不足道，以至它们从未被送达处于可作出答复的地位的任何人手中。

华盛顿甚至迟至 1949 年 3 月仍怀着矛盾的心理，当时法国答应了保大皇帝，给越南以在法国联邦内的独立地位。然而，就在这一年将尽时，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促成了行动。哈里·杜鲁门总统于 1949 年 12 月 30 日签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48/2 法案，它实际上要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更进一步的扩大。这调动了一个被证明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东南亚与菲律宾事务却对此穷于应付。

美国人缺乏兴趣的一项证据是，国务院除泰国外没有东南亚问题的专门知识，它从未有过一个殖民属地，并定期给它派遣据情况变化需要的懂汉语圈子里的干员（菲律宾群岛到 1946 年 7 月 4 日为止一直处于内政部与军需部的管辖之下）。就向东南亚派遣的资格而言，通晓一些法语或荷语，或者能做到不得罪英国人是有用的。这样的派遣是强迫胜于求取。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机构，那三位最为直接地关注印度支那的官员，不是有法国背景便是同情法国，而很少知道或关心印度支那在哪儿。

背景是莫斯科于 1950 年 1 月承认了胡志明，华盛顿则于 2 月 7 日承认了保大。法国仅用了 39 天时间便争取到了军事援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基于这样的理由迅速提供了支持，即其他选择只能把这个地区送给共产主义。这时，远东事务司除了印度支那代表团外，仍然由美国政府中关于亚洲问题的一些极干练和最有知识的专家所配备着。怀疑而又为某些情况下事件所形成的方式所震惊，他们对要为在中国的崩溃寻找替罪羊的正在上升着的公众舆论和国会喧闹日益烦躁。此外，由他们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所率领，腊斯克那时以在任何问题上的不偏不倚而著称。

另一方面，欧洲事务司则对来自巴黎的任何建议惊人地敏感，法国人说，不重视法国的请求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尽管强有力的法国共产党在整个问题上表示冷淡。真正使法国人感到棘手的是，那些专业的干部被杀害的要比他们所能培训出的更快些，而且经济上的开支正超出马歇尔计划对法国的所有援助。在印度支那只有印度支那人才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那些决策者们并未发现，而确实到 18 年以后的特德和平攻势时才发现。再者，欧洲事务司清楚地知道，在同远东事务司的任何竞争中，它通常是获胜的。

所以，1950 年 5 月 8 日，当朝鲜战争尚未在地平线上出现之际，华盛顿宣布了一项经济上和军事上援助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6 月 25 日的事件招惹了一场不合乎程序的混乱。把我拉来当

东南亚调查团团长这项差事，部分地是由于没有一个比我地位高的人想要这项工作，部分地则是考虑到我关于中国的经验可能是有用的。但这并不完全像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无论如何，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而且在干涉中，任何警告不存在仅仅采取一个步骤就无下文的情况。我们所得到的指令即要在现场勘察的基础上，对那项已宣布的援助计划的实施情况提出汇报。

法国人在技术程度上同该调查团的合作是堪称典范的，乃至是诚恳的。陆军、海军、空军部队以及海岸巡逻队的代表们，同他们的法国搭档一道得心应手地工作着，法国人把他们所想看到的一切都给他们看，讨论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坦率地指出了不足之处，而且也不掩饰他们关于目前这种僵局不能再拖延很久的信念。在越南所度过的三周时间，对达成一项法国人所要求的协议来说已绰绰有余，美国人发现这些要求是合于既定的那些目的的。

这些问题是最迫切的并几乎马上就要表现出来了。第一个问题便是情报工作。此时的军事形势如何？卡彭蒂尔将军开初在皮格农支持下，明确表示越南人不会在任何程度上或任何阶段卷入。要是任何人抱有这种想法，那他会一有必要就甩手不干。这一立场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严格的军务范围之外了。法国军队的配置不成问题；我们能够在我们选定的任何地方观察他们，而且也观察了。问题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部队的实力与配置。法国人并不了解它，而他们却以为已经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一点已变得愈益清楚。

法国人的战略是保证在一定距离之间筑有碉堡的那些交通线，以用于根据敌人集结的情报给予打击，但仅仅是在白天。法国人不无勉强地承认，要是说他们表面上控制了白天的话，越南独立同盟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控制夜间。因为在所有的游击战中，敌人是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的。没有人去费心思虑一番要取得该战略的成功，到底需要有多少法国军队方才适量。美国调查团的军事小组组长 G. B. 厄斯金少将明显怀疑法国人对其敌手的了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太平洋上服役的经验，使他对亚洲人的战斗能力怀有一种相当大的尊重。

法国人对其所处的进退两难境地的辩解，集中地倾向于断言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越南独立同盟便会渐趋消亡。这样的帮助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援助的种类以及给了多少，却没有确凿的证据。谣言的范围是没有边际的。所提出的事实中，最为不详的就是中国人正沿着他们的南部边界调兵遣将，准备入侵东京地区。即使从设在谅山的外籍志愿兵团可以看到中国边界的哨位上，我们也未能看到什么。我还是向厄斯金提议乘坐一架飞机，事先也不告诉法国人我们想去干啥，向北飞去亲自看一看。厄斯金将军也认为

在该地区连一只山羊也无法藏匿，更不用说一支军队了。卡彭蒂尔对我们所干之事怒火中烧，但我们却再也没听到过中国入侵之类的言谈了。

这幕喜剧加剧了怀疑的广泛增长。既然法国人没有能力精确侦知敌方的实力与战斗能力，法国军队真的了解他在干什么事吗？厄斯金不想去抓紧做这件事，尽管他显然地是作了很大的保留。部分的原因，即他的心思和热诚不在越南，而在他所钟爱的第一海军师上。这支经他训练并指挥过的部队，可能很快就在没有他统率的情况下开赴朝鲜了。这对他来说几乎是难以忍受的。还有部分的原因，即我们都知道随着朝鲜那种恐怖局面的加剧，看来五角大楼中没有一位权威人士会对我们关于驻东南亚法国人的军事判断的惑疑，给予多少关注了。根据皮格农的一些令人心灰意懒的评论，巴黎也没有对他的那些抱怨予以多少关注，也不管会是什么样的抱怨。尤其是国务院，由于全神贯注于欧洲、北约以及朝鲜，更不容易聆听我这一介文职人员关于军事问题的见解。

华盛顿继续敦促我们着手这项工作。唯一的行动方针是从更为全面和更长期的角度去接近这个问题。我无法抑制那种厌恶的心情，即这完全是中国的翻版，只不过是名称，日期以及地点有所不同罢了。很明显，这里所出现的真正麻烦在本质上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对帮助驻印度支那法军的整个决策是个挑战。无论我们的指令是如何明确，这些指令并未正视这一点。

开初，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形势，西贡的看法同华盛顿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异。拼凑起这个调查团并派遣到东南亚的那种迫切性，除了行动所需的那些最为粗略的指令外，未能给予任何东西。既然在朝鲜占主要地位的事件，我们只得到了传统的军事分析的少许反应，这可能是最好的。从中国所得到的任何教训尚有待于吸取。一旦我们到了西贡，那种军事局面迅速地使人看到有相当大的差异。很清楚，皮格农与卡彭蒂尔既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理解那些后来所公布的法国驻华随员们的看法。他俩都继续坚持说堡垒体制经扩大和补充便可流行。对此，需要美国人援助的是物资而不是人员。我们同意那种形势是严峻的，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并不紧迫，尽管无甚进展，亦无法国人的防卫在可预期的将来会在越南独立同盟的压力下崩解的迹象。

然而，这并未对那些隐伏着的并且通常是来去无踪的越南独立同盟存在给予任何承认。越南独立同盟随时随地都能够使人感受到它的存在，而法国人对它来说则心中无数。举两个典型的而且是亲历的例子将证明这一点。有天早晨，当我转到西贡的大陆饭店的那个拐角时，有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就在我身后仍下了一枚炸弹。幸好这枚炸弹耽延了很长时间才爆炸，只不过炸坏了几块窗玻璃，但卡彭蒂尔却坚持要我从此以后在没有武装护卫的情况下就

哪儿也不去。由于无意成为一位死去的英雄，也无意由于其他原因而死在西贡，我是极易于被说服的。第二件发生于我们离开西贡那天早晨。受到极度惊骇的卡彭蒂尔将军到机场来为我们送行。他所宠爱的随从副官与门生于一小时前坐在诺罗多姆宫——法国人存在的那种憎恨的标记里的写字台前，而一枚炸弹就在他的座椅下爆炸了。这两件事对双方来说都是极为平常的，而且对双方来说只能导致在以后的岁月里，在美国引起那样一股抗议怒潮的那种野蛮的报复行动。

法国的军事力量是由法国的专业干部以及法国殖民军队组成的。任何越南人都是潜在的敌人。本来应该看清楚，最终只有越南军队会去战胜越南人。然而，明显的事实是，不论法国为此目的已签署了什么样的协定，法国人正在陷进越南去。我们谈判中未包括越南军方，实际上组建现存的为数寥寥的几个越南营是没有什么用的，而设在德雷特的军官学校所培训出的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受训人。卡彭蒂尔力言他所缺少的是有质量的越南人，这在技术上来说不错但却没有多大说服力。再者，一再重复暗示：越南人是战斗力差的士兵，撇开这样一个事实不谈，即越南独立同盟在这方面似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一经检验，也是站不住脚的。

海军陆战队中厄斯金将军的助手奈克·索恩舰长，颇惬意于他自己是个冒险家和幸运的战士，而他的履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法国人极不情愿地同意了他可以同一个越南小组一道外出夜巡。他回来之后，对巡逻队在执行任务中的那种残忍以及效率一言不发，目光呆滞，但这次使命是失败的。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搞情报讯问而去捕捉俘虏。然而，那些越南人却拒绝把身首仍连在一起的人随身带回来。当我私下向皮格农提出，他不愿培训和武装越南人是出于害怕他们掉转枪口来打法国人时，他并没有反驳我。

皮格农避免作出正面答复，是直接同这个问题的核心有关的，即使它未给予正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否认存在着一个不得不诉诸军事解决的军事问题，那将是愚蠢的。相信任何军事解决对于诸政治及社会问题的更为广泛和困难得无法捉摸的解决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正招致灾难。这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正是 20 世纪中叶的亚洲全都要解决的。

简便的方针似乎就是接受法国人的立场，而我们的指令就其所表示价值来看，会产生一整套表面上看似合理的技术性的建议，然后再搬到那邻近的国家以重复实习。但很快地，我看出这一方针似乎是一件荒诞不经之事。或许我仍被围绕美国在中国溃败的一片混乱状态所激怒，而且我确实仍未认真看待正在美国形成的那种不信任。

那个相对说来新的美国使馆很少有什么帮助。唐纳德·希思大使是十分

干练和谨慎的官员，他在亚洲没有背景，但是在美国机构中任何人也没有这种背景。希思充分意识到他自己的局限，他努力工作以弥补它；他甚至每天在越南人中上课，实际上没听进去什么。但作为他所摸索到的驻防部队的情况，对他来说是新的。他的基本反应是同法国人和睦相处，并把自己的疑虑埋藏在心里。

当技术性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的同时，上层的讨论与争辩也在无休止地进行着，而且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意见一致。牵涉到对局的三种观点或三种阐释。没有谁接受了一种观点后而真正准备去了解其他两种观点，更谈不上承认它们哪个更为正确了。

由于法国不再摆出一副置明显的矛盾于不顾而搞联合的样子，法国人的处境远远超过了最为复杂的情况。同胡志明的趋向于某种政治解决的谈判，在法国军队重返印度支那以后不久便开始了。越南独立同盟于1946年12月19日夜幕降临之后炸了河内的那座电厂，这些谈判即告中止。继后的会谈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以保大皇帝为首的、非共产党的越南政府。法国所热衷的是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仍留作整个尚未确定内部自治权的法国联邦中的一个成员。反之，越南人正想得到完全的独立。保大那种众所周知的优柔寡断，以及他对里维耶拉的舒适生活的喜好，是无可救药的。这种加长篱笆的最为重大的后果，便是不可改变地强化了越南人的猜忌，即法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信赖。

但是，1949年3月的埃丽西协定，以及随后法国政府于12月对这些协定的批准，仍然成了这样一种设想的基础，即一个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在印度支那出现了。^①不幸的是，在华盛顿给我们的指令中，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窥探法国人实际意图的东西。我对法国政治所具有的作判断的更广泛的基础不够了解，而西贡的使馆也同样处于昏暗不明中。就此而言，皮格农尽管很难对法国政治态度鲜明，却也几度表示，他对于巴黎想要的是什么，打算做什么或期望他去做什么相当没有把握。他是个坐守僵局的心灰意懒之人。

在我心目中迅速地清楚起来的是，皮格农与卡彭蒂尔并不喜欢他们已看到的自己所处的地位，极力反对可能削弱法国人控制的任何步骤，并作了充分准备，采取任何旨在阻滞或减弱这样的步骤的行动。我仅仅能觉察到的

^① 1950年11月，当我们调查完成之后，在波城的谈判决定执行埃丽西协定。那以后不久回到华盛顿，我写了一份愚蠢地自我陶醉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但愿我从未写过——，把这少而可贵的捐献增添给了那种欢悦的合唱：法国人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现在它忙于叫美国去干它的一部分。这是我曾经作出过的那些最错误的判断之一。

是，法国人在他们国内政治中制造混乱的天才，正给予这人颇大的自由行动的余地以按其意愿行事。就像从西贡所看到的，法国的殖民政策在其他地方可能更灵活些，然而在印度支那，该政策仍像过去那样呆板和僵化。

有时一件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似乎能够标志或代表一种局势的整个气氛与意义。法国人的殷勤待客是周到而又无休止的。正式宴会一个接一个，上不完的菜，碰不完的杯。烹饪方式也同那些酒一样，完全是法国式的。在最末一次宴会上，一道别出心裁的菜拼装在一个相当大的金盘里，其上方置着一柄罐装白色龙须的刀叉！

美国人的观点自身有矛盾，而且在 1950 年还有许多事要做，但它的一些设想正很快变得有争议并且甚至是有摩擦的了。最为主要的一项——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可回溯到该共和国最早期，即使美国人在西半球的某些行动似乎并不始终同这种做法严格地相一致。然而，远在 1778 年曾经是个玩世不恭的帮凶的法国人却相信它，其结论便是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决权（美国会在越南把它维持到一种辛酸的结局，而不管对有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多么空洞。还有许多越南人，更不用说柬埔寨人，仍然不像一些更无所顾忌的对这场战争的反对者所想的那样，把它看作一件十分简单的事）。

美国人的第二项设想出自那些基本上是对反对殖民主义持反对态度，或者最好对此不予优先考虑的人。这些人主要带有欧洲人的倾向。对他们来说欧洲的福利是首要的。如果法国相信越南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就应支持这一立场。欧洲事务司在给予法国援助的那项最初决定中，赢了第一个回合。确实从未有一个东海岸的机构具有那种传统上美国对卷入欧洲事务的憎恶，而它较之美国舆论的另一些部分，通常是更多地就对外政策发表意见的。

第三项设想以远东事务司为代表，正逐渐把美国人的注意集中到东亚，它很久以前就有把东亚作为商业上的亲缘关系国家的想法。这种设想的影响是不固定的和支离破碎的，如同正在形成的中国院外集团正在证明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运动，一个世纪内，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同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有了一些交往，它绝不是其中最不强大的力量。一部分是纯粹的浪漫主义。在接触过那种真挚的光彩夺目的中国或日本文化之后，没有谁曾经逃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以为他了解中国比他真正了解的要多得多，部分地是基于相信这一事实，即在早起用帆船同广东的贸易中，他的祖上有一位曾当过一艘船的船长。然而他的堂兄（原文如此——译者）西奥多·罗斯福，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看法。他全盛的日子可能是在圣·居安山上，但是他的心思和那海军联盟的设想则更为关注卡莫多·乔治·德威，以及美国于 1898 年驻留香港准备驶向马尼拉湾的舰队，这支舰队准备完成

把太平洋变成一个美国内湖的计划。“那向西流动的帝国的湖水……”，乔治·贝克莱大主教于大约 200 年前所吟咏之句，变成 20 世纪的一个现实。

然而急切重要的是这些随意选取的成分产生出了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一个机构，他们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及对什么是能做的和什么是不能做的，是从未有人赶得上的。他们中的几位在中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正留在美国驻泰使馆里，而泰国是调查团旅行计划中的一站。艾德温·斯坦通大使——懂汉语的官员中最干练的一位——坚定不移地反对该调查团的目的，而且他代表那种舆论说话。要是说美国曾处于影响席卷整个亚洲的现代化潮流之地位的话，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怎样，一种军事反应成了可能是最糟糕的反应。如果说他比起那些其他的官员来，对亚洲的共产主义没有更多的同情之心的话，那么他也不仅仅是把它看作俄国人控制下的一个傀儡，亦不会看作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

这一意见分歧将因美国人的第四种主张的迅速出现而被冲淡，这是一种会席卷全球的影响。它被称之为反共产主义。从 1945 年胡志明倡导会谈到 1949 年年底，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捉摸不定的政策，并且引人注目地惑疑，是否存在美国应当做甚或是能够做的事情。莫斯科和北京对胡志明的承认扫除了多数人的疑虑；朝鲜当时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目标，即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没有谁了解这种情况比厄斯金将军所了解的更为简明，他有一个，一般来说是文职官员，特殊来说是那些大使们所具有的一种相当偏颇的看法，在正式与非正式的会议上以及在他的军事报告中，毫不怜悯地反复强调美国的政策，就是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而且这也正是调查团的任务。他会在私下对我承认，许多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有待于解决，但先得在军事解决之后才能办到。他所怀疑的是法国人达成军事解决的能力。

应当予以某种认真考虑却未给予的第三种观点，是越南人的观点。没有透过那经常似乎并充满矛盾的表面而深入下去，发现或精确地认定这不是一种舒适的态度。即使是公使馆，同越南人的接触也是受到阻拦的。就连同南越军人单独交往这样的情况也不存在，卡彭蒂尔将军曾明确表示，一切军务均需同他讨论或通过他，或不要提起。^① 皮格农则惊异于既然我们的使命是

^① 卡彭蒂尔的英语大致同我的法语相当，厄斯金则全然不懂法语。这有时会带来相当的不便，除开我们在西贡的早期之外，那时我们有趣地发现：当我还是个居住在里约热内卢的稚童时，他就已是赴巴西的法国军事使团的一员了，我们共同用流畅的葡萄牙语交谈，使其他人摸不着头脑；然而在我们之间所形成的令人满意的私交，当分歧加剧时不止一次地证明是最有助益的。

军事性的，那为什么我们还想要别的什么联系。有时，在最后的时刻总是有些事阻止我们德拉特的旅行，德拉特是古代帝王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保大皇帝可能会控制一个越南人的政府（我们去柬埔寨的旅行正巧碰上皇帝及其主要部长们的外出。那位要去老挝的还在越南的法国行政中心便被阻止了，因为琅勃拉邦的机场因不期而至的倾盆大雨，突然被水所淹没）。

有众多的南越公务人员对我们是有用的，但多数是一些迷人的男子，他们在法国受过教育，并且就像住在西贡的家中一样住在巴黎。他们未必就是法国人的傀儡。很多人力图通过肯定是间接的方式告诉我那些正是皮格农不想让希思部长和我所听到的意见。颇为奇怪的是在河内，越盟的靠近使我们一天 24 小时都处于重兵保护之下，而越南管院则是相当直言不讳的。东京的崔市长，他在任何一个政府中都会是一位装饰性人物，也是直率的。

越南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会使那些多少了解点亚洲事务的人觉得惊奇。在近乎整整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从未真正征服过越南，而且他们也绝不会征服得了的。直至他们离开为止，越南不会有安宁。没有一个越南人实际信赖过法国人关于任何事情言辞。确实，除了越南独立同盟外，没有谁要法国人突然匆忙地离开。那只会意味着一项难以接受的越南独立同盟的迅速接管。然而，越南独立同盟基本上是个越南民族主义的政党，其中的领导者是由于没有其他领导者而产生的清一色的共产主义者。要是法国人按照预订好的条件，能够得到可信赖的保障安排撤离，越南人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否则，那些越南人便会把白种人驱逐出这块地方，无论这需要耗费多长的时间。究竟有什么理由说这已经变化了呢？只是在我们居留西贡已临近结束时，皮格农和卡彭蒂尔很不情愿地私下向我承认，在所有越南人的心目中，对法国人的憎恶超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姑不论他们的政治信念如何。

在该调查团动身前往新加坡前夕，8 月 7 日，我感到不得不向部里提出我所得出的某些结论。这些远不属我们所受指令的范围，但我相信它们会对调查团的既定目的是否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这一点，产生重要的影响：

（1）印度支那是东南亚防卫弧圈之关键，在印度支那组合体内，越南又是危机的焦点，其解决将大大决定老挝以及柬埔寨的结局。

（2）法国人，至少官方，主张问题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并认为这是唯一有希望的做法。皮格农同意应辅之以政治和经济的措施，但他的同意缺乏那种令人信服的理由。另外一些法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卡彭蒂尔，竟在私下交谈中流露出一信念，即虽然不存在为何运用特定的武力不能打破越南独立同盟的军事支柱的理由，这样一项方针将解决不了只是到后来以同样

的形式，或另外的形式重新出现的基本的越南问题。卡彭蒂尔坚持说法国人不能够采取那种必须补充的政治行动。越南人声称而许多法国人不情愿地同意，对法国人的憎恶与不信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没有长期合作的真正基础存在，并且也不能在目前的基础上存在。

（3）法国人的军事努力，尽管在红河三角洲取得一些成功，到目前为止远未粉碎越南独立同盟的军事力量。法国人陷入了那种与随即会突然破碎的罐口相类似的境地。假定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武力、恐怖、宣传、渗透的政策，并愤世嫉俗地褫夺任何机会，这一概念会表现出是愚蠢，乃至是危险的。法国人显然也未能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使南越部队发挥特殊的作用，即如同在谅山的指挥官所提出的，要是更多地作了使用，那么也应对越南人作出更大的让步。显然，法国人也害怕武装的越南人可能掉转枪口来对准他们，越南独立同盟的军事力量的增长表明，越南人的部队可以迅速和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战斗。

（4）能表明法国军队面临那些困难的是红河三角洲形势。对法国来说，征服从外表上看意味着控制固定的强大据点，没有敌人的重要军事行动，以及农民能够在昼间不受干扰地耕耘他们的土地。我们在法国人于一年前作了清除的东京之一个地区所看到的稳定景况是，我们没有武装卫护便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未能恢复并维持最低量的足够公路系统，甚至在河内存在一连串无休止的暗杀，还存在共产党人的宣传的继续与大量的增加，而没有相应的和有效的对抗措施。我没有证据表明，有谁知道在红河三角洲，越南独立同盟到底在夜间干啥，我相信我们必须承认越南独立同盟在积极着手组织与训练最下层的普通农民，以便及时地使用……

（5）至于说到越南人的态度与想往，特里区长，一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对另一些负责的越南人的言论作了最好的综合。他和其他人反对那种主要由于法国人未能协助建立起足以履行其国内职责的南越武装力量，因此法国人在此时全部撤离便会招致灾难，并且只会导致共产党人胜利之说。法国人从未真正征服过越南独立同盟地区，而如上所述，这是一些法国人亦同意的。只有越南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后将会出现的那种前景也必须有些保障。越南人主要关心的是实际上的独立。越南无论如何必须获得它，并将在其可能必要之处寻求同盟者。其他问题则可留待此后处理……既然战后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法国意欲尽可能在印度支那重建其殖民地，没有什么法国的保证可以真正被接受下来。任何保证必须由越南所信赖的一些人来连署……

（6）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足够部队得恰当使用，加上刺激法国进入一

种更具有进攻性的精神状态，在相对有限的可预见的将来，能够保住印度支那这只“茶壶”的嘴子。但它将不能解决长期的问题。在法国人目前所处的前提下，或未有心理上和态度上根本的转变，法国人亦不能解决问题。如果通过短期的办法有助于美国的利益，那么其他的需求就同我们无关。然而，要是那种较长的小道是重要的，那么，这就是一件最密切关注的事了。

一项长期满意的解决只有在法国被说服变得更为明智，而且越南人由经受过那种青年期渐痛后的人所坚定领导着之时才能找到。我所要提的建议如下：一项法国人给越南人在 5 年、10 年、20 年或 30 年的特定时期内实现独立的承诺，……一支越南国家军队应迅速创建，以担负起国内局势的职责，当这一点有了进展时，法国军队应撤至边境或撤出不需要驻留的地方。内部的行政管理应当迅速由越南人担负起来。所有这类协定应当有联合国的保障，以及必要的监督。可以设想美国应像既往那样承担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即使认识到这种形式不大会引起在巴黎街头的跳跃，这种或有某种类似的是拯救任何东西的仅有的真正希望，而法国人一定被迫认识到这一点并据此行动。要是越南像所有迹象表明的那样，决心要完全独立，面对法国的反对，它可能在很长时期内不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它能制造某种骚动以继续消耗法国的力量，而最终只能有利于共产党人。凑巧，美国人在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中同法国人相一致，最终必然进一步削弱美国人在亚洲的影响。历史地看，没有一个统治集团在面临来自被统治地区的积极甚至是消极的抵抗时，曾经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不甚明确的权力，或者没有在这种进程中毁灭它自身。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打算成为一种例外。

在我们离开东南亚之前，我收到了在巴黎住了几周之后已返回西贡的皮格农的一封信。他希望我们在返回华盛顿前能有一次最后晤谈。我只身一人去见他，而他似乎由衷的高兴见到我。我未发现他所带回的任何不同的详细指令或新的指导路线。履行埃丽西协定的波城会议，仍然在无休止地拖着，陷入了技术性问题的争吵中。蒲列文政府仍然更为全神贯注于印度支那以外的事务。至于皮格农自己我看不出他对于“我们心爱的印度支那”，抑或对那种法国人“负有传播文化使命”的尊严这一基本态度有何变化。简言之，没有什么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回到华盛顿后，我应邀于 11 月间出席了国务院政策规划参谋处的一次参谋人员例会，该处当时在乔治 F. 凯南指导下是颇有影响的。那天的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项议程涉及了那些从各种渠道接收到的警告：如果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继续其向鸭绿江的挺进，中国人会被迫介入的。经过长时

间讨论后共同一致的意见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刚是一年多点的时间，而且又有仍未解决的堆积如山的问题有待于解决，它能够作对外冒险的那种机会是极少的。印度支那则是那天议程上的第二项议程。

那些参谋人员有礼貌地注意听取了我的报告，还提出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就在越南事务中再也没有任何纠缠了。

（本文系 [美] 约翰 F. 梅尔比著，译自《外交史》1982 年冬第六卷第 1 期，密芝冈大学编 *Diplomatic History*, Vol. 6. No. 1. winter, 1982；原载《民族研究译丛》1983 年第 3 期）